

追源溯流，旁敲側擊： 論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

陳岸峰*

（收稿日期：102年9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3年3月6日）

提要

一般論述均以為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之文學史觀乃對胡適文學史觀的挑戰。事實上，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表面上攻擊胡適文學史觀及其種種不足，並回擊了胡適昔日他兄弟二人及師承之學術批評；而其貶抑「載道」而揄揚「言志」，甚至提倡晚明小品文之個性與抒情，均乃意圖力挽左翼之挪用五四文學遺產作為革命宣傳之狂瀾。準此而言，周作人在書中之「追源溯流，旁敲側擊」既是其論述策略，亦是其以學理釐清真相、建構國語及提倡晚明小品文，藉此以捍衛五四文學傳統之獨立與尊嚴。

關鍵詞：周作人、胡適、新文學、公安派、國語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助理教授。

一、前言

1956年由劉綬松（1912-1969）所撰寫的《中國新文學初稿》有這樣一段頗為隱晦的文字：

舊中國的反動人們就曾經這樣卑鄙險詐地歪曲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真實的歷史。他們有的把從五四時期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說成是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繼承和發展，……有的把新文學運動僅僅地說成是文字工具上和形式上的一種改良或革新運動，而一筆抹殺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社會意義和新文學在中國革命史上所起的偉大的戰鬥作用。¹

以上文字巧妙地隱匿了五四時期的兩位著名學者及其文學史論述，先是批判了將新文學運動上溯公安派與竟陵派的周作人（星杓，1885-1967）及其《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繼而鞭撻提倡白話文與文學形式改良觀念的胡適及其《白話文學史》。²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與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這兩本觀點截然不同的文學史論述，前者乃對後者的文學史觀作出種種的商榷與旁敲側擊的挑戰，孰料事隔數十年後，卻在狂飆的年代被並列揪出來批判，由此益顯這兩本文學史著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是在1932年3、4月間，應輔仁大學之請，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為題作連續講演。³鄧恭三（鄧廣銘，1907-1998）為他記錄講詞，經周作人校閱並易名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後，於同年9月在北平出版。⁴此書雖乃演講稿，卻非無的放矢，周作人以下的謙語，意味深長：

這講演裏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並非依據西洋某人的論文，或是遵照東洋某人的書本，演繹應用來的。⁵

¹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頁2。及至2007年，黃修己仍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批評周作人的文學史觀評為「不承認歷史的進步，甚至還倒退了」。見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1。只有夏志清曾對周作人的文學觀予以同情的理解。見夏志清、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年），頁14-16，110-111。

² 相關論述可參閱張如心：《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頁69。

³ 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15。

⁴ 周作人：〈小引〉，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周作人於九月十日與十三日收到尤炳圻寄來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分別是兩冊與三十冊。詳見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頁422。

⁵ 周作人：〈小引〉，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2。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深受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影響，而林傳甲（歸雲，1877-1922）的《中國文學史》則仿日本笹川種郎（1870-1949）的《支那文學史》而撰。周作人之無所依傍，實則獨樹一幟，其矛頭既指向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學陣營之文學史觀，而更為關鍵則在於劍指 1928 年所崛起的「無產階級文學」，及 1930 年以其兄長魯迅（周樹人，豫才，1881-1936）為盟主而成立的「左翼聯盟」所倡導的革命文學觀。⁶以下將從周作人的文學觀、文學史觀談起，由此為基準，以把握他對新文學運動「追源溯流」與「旁敲側擊」之理據，再由其有關桐城派古文與八股文的見解，探討此中他對胡適與左翼作出抗衡的原因所在，⁷並下及其「理想國語」的構思以及晚明小品文的提倡，由此以全面呈現其迥異時流之文學史觀及其意義。

二、文學·純文學·通俗文學·原始文學

（一）文學的定義

周作人認為「文學」很難下定義，⁸而他其所提出的文學、純文學、通俗文學以及原始文學的幾個概念，則頗為迥異時流。例如，胡適便沒有「純文」與「雜文」之分，只區別為「文學的」與「非文學的」兩項。⁹周作人所提出的文學觀乃以人為本：

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¹⁰

⁶ 1928 年 1 月，由共產黨員作家成立的太陽社創辦的《太陽》月刊、《文化批判》以及《創造月刊》共同倡導「革命文學」，「反個人主義」，並指出「一切藝術都是宣傳」。分別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91；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4 年），頁 227。

⁷ 1928 年 1 月，郭沫若在以「麥克昂」為筆名發表的〈英雄樹〉中宣稱「個人主義的文藝老早過去了」，代之而起的必定是「無產階級文藝」。同年 3 月，傾向自由主義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則在《新月》月刊的創刊號上發表維護「獨立」、「健康的原則」及「尊嚴的原則」。由此可見，這是兩股勢力的抗衡。詳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頁 191。

⁸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5。

⁹ 胡適：〈什麼是文學——答錢玄同〉，《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 年），第 1 集，頁 217。

¹⁰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5。

隨其美妙的形式與愉快的感覺的文學觀的進路，周作人視文學為藝術品而「加以賞鑒」。¹¹他並進一步提出「文學只有感情沒有目的」，如一定要說其目的，也只是以「說出為目的。」¹²沒有「目的」，遂成其「文學無用」論：

文學是無用的東西。因為我們所說的文學，只是以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為滿足的，此外再無目的之可言。裡面，沒有多大鼓動的力量，也沒有教訓，只能令人聊以快意。¹³

周作人的文學沒有「目的」、「文學無用」論，不止迥異於胡適、陳獨秀（仲甫，1879-1942）的以文學作為啟蒙的觀念，亦與其兄長魯迅所指出的其時為「掙扎和戰鬥」的年代，¹⁴並從「啟蒙主義」角度指出小說或文學必須是「為人生」之觀念，¹⁵大相逕庭。周作人所提出的文學沒有「目的」、「文學無用」論，似乎有點不合時宜，而實際上其所面向的主要是左翼之文學革命論與宣傳論，即他所婉諷的「還是想以載道的老少同志」。¹⁶周作人的文學無用論，並非一時的衝動，在〈關於寫文章〉、〈關於寫文章二〉以及《苦茶隨筆·後記》中他一再申述這一迥異於時流的文學觀。在其心目中，「文藝只是自己的表現」，¹⁷而且：

……不朽決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會也並非著者的義務，只因他是這樣想，要這樣說，這才是一切文藝存在的根據。¹⁸

他認為如真的要說文學的用處，那就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公元前 384-322）在《詩學》（*Ars Poetica*）中所說的「袪除作用」，¹⁹亦即「淨化作用」（*Catharsis*），意指讀者在閱讀或觀看悲劇後獲得心靈的洗滌。在他而言，讀文學也只是為了「享樂」而已。²⁰簡

¹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9。

¹²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14。

¹³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14-15。

¹⁴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第 1 冊，頁 814。

¹⁵ 見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第 1 冊，頁 792。由此可見，周氏兄弟兩人的文學觀，可謂截然不同。

¹⁶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671。

¹⁷ 周作人：〈文藝上的寬容〉，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頁 8-9。

¹⁸ 周作人：〈《自己的園地》舊序〉，止庵校訂：《苦雨齋序跋文》，頁 20-21。

¹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15。

²⁰ 周作人：〈古文學〉，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頁 21。

而言之，這是文學的藝術論、無目的論、無功用論。其時，新文學的主帥胡適宣稱其掀起新文學革命的原因在於千年以來的白話文學史，「只有自然的演進，沒有有意的革命」，²¹而自文學革命之後，中國文學便「走上了有意的創作的新路」。²²「有意的革命」與「有意的創作」，便是胡適《白話文學史》的基本立場及其新文學史觀。胡適之「有意」論與周作人之「無用」論，從目的到功用，同在新文學陣營中，彼此對文學的認知竟有如此巨大的落差。

基於無目的論、無用論的文學觀，周作人在〈新文學的要求〉一文中，提出「人生的文學」並闡釋為：

- 一、這文學是人性的，不是獸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 二、這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卻不是種族的，國家的，鄉土及家族的。²³

「個人」與「非國家」的，基本就是對當時左翼文學論調的抗衡。周作人認為左翼的「文學即宣傳」實際上不比「文以載道」好，他認為這是「文學史所給與的教訓」。²⁴而他所指出的教訓，自毛澤東（潤之，1893-1976）在1942年5月2日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竟成現實。周作人又以「文學的主位的人的本性」與「文學的本質」，分別對以上的「人生的文學」的闡釋作了兩項定義，這又截然不同於胡適的以文學作為「啟蒙」、「文藝復興」以及「再造文明」的理想。²⁵周作人指出胡適所提倡的「文藝復興」，「顯然有點近於夢想」，並從國內外目前種種的情況對此夢想表示擔憂，希望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整個的而不是局部的」。²⁶

站在以人為本位的文學立場，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列舉了十大類「非人的文學」，此中便有胡適努力考證並推崇為白話文學典範的《西遊記》、《水滸傳》，以及他所攻擊的俞樾（蔭甫，1821-1907）所著的《七俠五義》。在此文中，周作人認為《西遊記》屬於「迷信的鬼神書類」，《水滸傳》與《七俠五義》則屬於「強盜書類」。²⁷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文學的國語」的概念裡面，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及《紅樓夢》作為白話文學範本的四部小說中，²⁸在此便被周作人刪減了一半。胡適很有風度地稱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為「一篇最平實偉大的宣言」，然而卻進而說：

²¹ 胡適：〈引子〉，《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4。

²² 胡適：〈引子〉，《白話文學史》，頁5。

²³ 周作人：〈新文學的要求〉，止庵校訂：《藝術與生活》，頁19。

²⁴ 周作人：〈文學史的教訓〉，止庵校訂：《立春以前》，頁123。

²⁵ 相關論述可參閱陳岸峰：《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頁145-157。

²⁶ 周作人：〈文藝復興之夢〉，止庵校訂：《藝術與生活》，頁19，20。

²⁷ 周作人：〈人的文學〉，止庵校訂：《藝術與生活》，頁13。

²⁸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第1集，頁60。

他所謂「人的文學」，說來極平常，只是那些主張「人情以內，人力以內」的「人的道德」的文學。²⁹

胡適先是從理論上貶低其價值，指出這些舊小說「思想內容實在不高明，夠不上『人的文學』，然而若按周作人的新標準而衡量中國古今的文學，「真正站得住腳的作品就很少了」。這等於諷刺周作人的文學標準懸之過高，將絕大部分古今文學作品都橫掃在地的標準，還有作為標準的意義嗎？周作人的目的何在？胡適在結束這一段之前引錄了一段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的原文作結：

所以周先生的結論是：「還須介紹譯述外國的著作，擴大讀者的精神，眼裡看見了世界的人類，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³⁰

換言之，胡適推崇的那些小說，沒法養成人的道德、實現人的生活，而惟一的途徑便是依循周作人所指出的新的方向，放眼世界，譯介外國著作，一如他與兄長魯迅早年在譯介外國小說的努力方為正途。最後，胡適意味深長地說：

十幾年來，當日我們一班朋友鄭重提倡的新文學內容漸漸受一班新的批評家的指摘，而我們一班朋友也漸漸被人喚作落伍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最後代表者了。³¹

即是說，無論周作人如何的翻陳出新，在左翼以「更新穎的文學議論」，³²生搬硬套外來理論術語以討伐文壇前輩的形勢下，³³胡適與周作人甚至於魯迅的「落伍」，並無二致。

另一方面，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將「平民」與「貴族」並置，並推崇平民的文學而貶抑貴族的文學，周作人則對「平民」與「貴族」作出新的定義，在〈貴族的與平民的〉中將「平民的精神」按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之闡述為「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即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所說的「求勝的意志」，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後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後者

²⁹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冊，頁137。

³⁰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冊，頁137。

³¹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冊，頁138。

³²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冊，頁138。

³³ 可參閱丁文：〈周作人與1930年左翼文學批評的對峙和對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5期（2009年），頁125。同被左翼的馮乃超列作「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而加以批判的還有魯迅、葉聖陶、郁達夫以及張資平。詳見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頁228。

卻幾乎有點出世。³⁴在此，周作人借用西方哲學，對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中對立起來的「平民」與「貴族」兩個概念作了形而上的分析，高低立判，顯然「無限的超越的發展」與「出世」的貴族精神要比「有限的平凡的存在」與「入世」的平民精神，更值得推崇。他又以漢、晉、六朝的詩歌與元代的戲劇為例，說明貴族的文學與平民的文學的不同，即是人生觀之不同。³⁵從而，他有以下完全截然不同於胡適的文學發展觀：

……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發達的時代必須多少含有貴族的精神。……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從文藝上說來，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³⁶

這與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中指出的貴族與文人向民間學習、模仿而最終導致走向白話文學的觀點完全相反，例如胡適指出西漢文人受了民間文學的影響、「陳後主的詩很有民歌的風味」、李白（太白，701-762）「大膽地運用民間的語言，容納民歌的風格」、杜甫（子美，712-770）「最愛作打油詩遣悶消愁」。³⁷周作人在此則完全顛倒過來，乃從平民的文學走向「貴族的洗禮」，即其所謂的「純粹文學」。³⁸而任何帶有目的性的文學觀，周作人認為都是「變相的文學」。³⁹由此推論，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學陣營之啟蒙文學觀，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之革命文學觀，以及後來的「工農兵文學」，都是「變相的文學」。在胡適等傾向自由主義的作家提出維護文學之「獨立」與「尊嚴」以抗衡左翼之反個人主義與文學即宣傳之外，周作人更細膩地提出文學之屬性為「個人」、「品味」及「藝術」，⁴⁰此為其在當時將文學視作啟蒙與革命工具論之外所提倡的「純文學」。

（二）原始文學與通俗文學

周作人指出「純粹文學」只是「山頂上的一部分」，在其下則為「原始文學」。山歌、民謠這些「文學上最低級的形式」都是民間所創作，便是「原始文學」，遠早於《詩經》之前已存在，而「拋開了這一部分而不加注意」者，⁴¹便是胡適。胡適坦承其《白話文學

³⁴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頁 15。

³⁵ 周作人：〈貴族的與平民的〉；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頁 15。

³⁶ 周作人：〈貴族的與平民的〉，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頁 28。

³⁷ 見胡適：《白話文學史》，頁 39，109，209，247。

³⁸ 周作人：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15。

³⁹ 周作人：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16。

⁴⁰ 當時的評論便認為：「也許「普羅」和寫實的文學，對於周先生不合脾味，所以不說了罷。」見：〈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人：《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95-96。

⁴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7。

史》中《詩經》的缺席的原因在於剛從外國回來，「手頭沒有書籍，不敢做這一段很難做的研究」。⁴²山歌、民謠雖也在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中出現，但並沒有作出深入而系統的論述，這一切都是後來顧頡剛（銘堅，1893-1980）等人所搜集而加以補充的。⁴³早在1925年，周作人已曾撰文對胡適在武昌大學所作的〈談談《詩經》〉的演講中的解讀作出了「可笑」、「笑話」的嘲諷，並寄語胡適：「要大膽，要大膽，但是不可太大膽。」⁴⁴周作人的建議是若將《詩經》中的「國風」視作民謠閱讀，一定對當前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很有效用。⁴⁵至於「原始文學」之提煉而流行於民間，則為周作人所指的「通俗文學」。⁴⁶周作人更指出道教與俗文學對民間的影響，其道教「影響中國社會的力量最大」之論，則又迥異於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以兩章的篇幅強調翻譯的佛經對民間的影響。至於周作人提出「全體」的文學史觀，⁴⁷亦是針對胡適在《白話文學史》及其他文章之集中於推崇、挖掘白話文學，幾乎完全摒棄古典文學或「貴族文學」，同時亦是濟左翼之限於革命文學之流弊。

三、文學史觀及治文學史的方法

（一）文學史觀

有別於胡適的白話與文言的雙線文學發展的文學史觀，周作人提出「言志」與「載道」之頡頏說，⁴⁸並指出這兩種文學潮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其動態如下：

⁴² 胡適：〈自序〉，《白話文學史》，頁8。胡適及其學生顧頡剛以及其他學者包括周作人等，則在《古史辨》中展開了對《詩經》的劃時代的研究。相關論述可參閱陳岸峰：《疑古思想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胡適與顧頡剛》（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頁79-103。

⁴³ 相關論述可參閱陳岸峰：《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胡適與顧頡剛》，頁123-140。

⁴⁴ 周作人：〈談《談談詩經》〉，止庵校訂：《談龍集》，頁131，132，133。

⁴⁵ 周作人：〈古文學〉，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頁22。

⁴⁶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7。鄭振鐸所撰寫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四冊），在1932年12月由北平樸社出版，有意將歷來不為文人士大夫所重視的彈詞、寶卷、小說及戲曲，納入「俗文學」之中。鄭振鐸該書出版後，備受矚目，資料之嶄新，連魯迅亦不得不說：「鄭君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持孤本秘籍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為學子所珍賞，宜也。」雖說自己所用「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故遂孑然於學林之外」，但還是向書店預訂此書。見魯迅：〈致臺靜農〉，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南腔北調集》（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2冊，頁1989。有關鄭振鐸的文學史研究及其貢獻，可參閱范寧：〈鄭振鐸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傑出貢獻〉，見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代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13-422。

⁴⁷ 周作人；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8。

⁴⁸ 周作人在1930年4月17日《益世報·副刊》與1931年3月10日《青年界》第1卷創刊號上發表〈金魚〉，提出寫文章沒有目的與有的之分，而從區分「言志」與「載道」之說，乃因當時的「天下形勢似乎已大變了」。文章後面指出其時「載道容易而言志難」，以自己的文章的「少言志而多載道」，「以志時風之轉變」。周作人著；止庵校訂：《看雲集》，頁16，19。這是周作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之

中國的文學，在過去所走的並不是一條直路，而是像一道彎曲的河流，從甲處流到乙處，又從乙處流到甲處。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轉變。⁴⁹

周作人甚至具體列出在中國歷史上「言志」與「載道」兩派此消彼長的情況：（一）晚周；（二）兩漢；（三）魏晉六朝；（四）唐；（五）五代；（六）兩宋；（七）元；（八）明；（九）明末；（十）清；（十一）民國。單數時期為言志派，雙數則為載道派；前者為「即興的文學」，後者為「賦得的文學」；新文學的基本觀念是「言志」，而林紓（群玉，1852-1924）以及桐城派古文學的基本觀念則是「載道」的，故「二者根本上是立於反對地位的。」⁵⁰ 周作人點名對胡適《白話文學史》中的直線文學史觀作出商榷，並提出中國文學始終是由「言志」與「載道」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著。⁵¹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乃「有意的革命」，⁵² 故而為達目的便「六經皆我注腳」，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則乃從歷史的現象作考察、爬梳、論證，故而脈絡分明。然而此論一出，即招來不少質疑，中書君（錢鍾書，默存，1910-1998）指出周作人以「詩言志」與「文以載道」區分流派並不恰當，「文以載道」的「文」指的只是古文或散文，並不涵蓋一切近世的所謂「文學」，而「言志」的「詩」則主要是表達主觀的情感，在傳統的文學批評上，並行不悖。⁵³ 朱光潛（孟實，1897-1986）亦在《談文學》中指出「載道」與「言志」並非對立，文藝的「道」與作者的「志」乃融為一體。⁵⁴ 朱自清（佩弦，1898-1948）在《詩言志辨·序》中亦認為「言志」的本意原與「載道」差不多，「兩者並不衝突，現在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⁵⁵ 由此，不少論者便稱周作人「言志」與「載道」兩派此消彼長的觀念為「輪轉循回的文學史觀」；⁵⁶ 或讀出其貶抑「載道」而揶揄「言志」的現實動機，則乃其對文學之淪為革命與宣傳工具之不滿。⁵⁷ 實際上，其「言志」與「載道」之分實乃一時

以文學宣傳革命之嘲諷。詳可參閱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頁396。關於其時左翼文學之相關論述，可參閱羅崗：〈寫史偏多言外意——從周作人《新文學的源流》看中國現代「文學」的建構〉，《記憶的聲音》（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頁71-74。

⁴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18。

⁵⁰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45。

⁵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17。

⁵² 胡適：〈引子〉，《白話文學史》，頁5。

⁵³ 中書君：〈附錄三：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見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83-84。

⁵⁴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頁243-244。

⁵⁵ 朱自清：〈序〉，《詩言志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

⁵⁶ 例如，胡有清：〈論周作人的個性主義文學思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1996年），頁209；郝慶軍：〈兩個「晚明」在現代中國的復活——魯迅與周作人在文學史觀上的分野和衝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6期（2007年），頁5；丁文：〈周作人與1930年左翼文學批評的對峙和對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5期（2009年），頁125。

⁵⁷ 丁文：〈周作人與1930年左翼文學批評的對峙和對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5期（2009年），

的「便宜的說法」，⁵⁸藉此以抨擊左翼之革命文學觀與工具論，實乃此中之關鍵。周作人在此隱藏的擔心是五四文學革命之「言志」傳統被左翼篡改為「載道」，這亦正是胡適的擔心之所在。在盡量淡化論爭而又彼此不無擔憂的心照不宣中，胡適與周作人在學術上的較量，相對而言反屬次要。

（二）治文學史的方法

逐一批駁了胡適的文學觀與文學史觀之後，周作人又指出當前的歷史研究法乃「孤立」、「隔離」的研究，指出文學史、社會進化史、政治經濟思想史等均為文化史的一部份，即應拓展歷史研究法的範疇。⁵⁹而且，他又批評應用「近來治文學的人」的「應用歷史方法」有時「過於機械」，⁶⁰矛頭顯然又直指以歷史研究方法而聞名於當世的胡適。胡適自然不甘示弱，他在 1935 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便作出反擊，指出：

國內一班學者文人並非不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實，他們所缺乏的只是一種新的看法。⁶¹

最後一句，胡適再一次重伸其被周作人所譏諷為「機械」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雖「貌不驚人」，卻是如「哥白尼的天文革命」。⁶²胡適在 1921 年 6 月 30 日的日記中，道出其所理解的「歷史的方法」，一頭為原因，一頭為效果。⁶³胡適又在〈國語文法概論〉具體闡釋其研究法，⁶⁴並舉出歸納、比較與歷史的研究法三者之間的關係。⁶⁵胡適把研究歷史演進的方法，轉用於小說考證尤其是用在具有時代背景的寫實小說上，用意無非是為白話文史尋找其淵源及合法性，正是他應用了「歷史的研究」法作為方法論的示範，將白

頁 125。

⁵⁸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 675。

⁵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8-9。

⁶⁰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12。

⁶¹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集，頁 127。

⁶²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集，頁 128。

⁶³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第 2 冊，頁 459。

⁶⁴ 胡適：《胡適文存》，第 1 冊，卷 3 頁 499。余英時先生指出胡適在方法論上將杜威的實驗主義與中國考證的傳統結合起來，恰好同時具備了精嚴性和彈性，其方法論較之清代考據更精密嚴格而且更系統化，成為其所宣稱的「科學方法」，這種「歷史的研究方法」應用到小說、戲劇、民間傳說、歌謠的研究、辨別古史的真偽，以至於批評傳統的制度和習俗，均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 年），頁 52-53。

⁶⁵ 胡適：〈國語文法概論〉，《胡適文存》，第 1 集，卷 3，頁 499。

話小說「經典化」的過程呈現於世人面前。⁶⁶然而，這在周作人看來，卻是「孤立的」、「隔離的」歷史研究。周作人對胡適之「歷史的研究法」之批判，自有其目的，而他又如何展示自己的歷史的研究方法呢？這可見於他隨之為新文學運動所作的追源溯流。

四、追源溯流：公安派與新文學運動

在觀念上作出釐析與批駁之後，周作人又指出胡適的「八不主義」，乃復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與「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⁶⁷只不過「加多一種新近輸入的科學思想罷了」。⁶⁸所謂的「新近輸入的科學思想」，指的是胡適一直鼓吹的他的老師杜威的「實用主義」。周作人又進一步伸述如下：

明末的文學，是現在這次文學運動的來源，而清朝的文學，則是這次文學運動的原因。⁶⁹

他甚至稱公安派為「前一期的新文學運動」。⁷⁰瞭解新文學運動的起因及其與明、清末兩期文學的關係，實屬必要，然而無論胡適還是陳獨秀或其他新文學陣營中人的論述，大多只是以革命話語攻擊舊文學陣營，而卻缺乏學理與源流的考察。當然，周作人也簡化了新文學運動的內涵，例如胡適高舉白話文學革命以達致啟蒙以及文藝復興的目的，便是其不同於公安派之所在。

周作人進而指出袁宏道（中郎，1568-1610）在〈雪濤閣集序〉中所表達的文學史見解，較諸胡適所說的「『中國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⁷¹周作人認為袁宏道批評江盈科（進之，1553-1605）的詩，用「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字乃「詩言志」派的一向主張，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的更中肯的，就連胡適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要領。」⁷²如此批評，將置作為新文學

⁶⁶ 參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85-239。

⁶⁷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52-53。

⁶⁸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47。

⁶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29。

⁷⁰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675。

⁷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24。

⁷²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24。一位筆名為「主」的評論者亦認為最近胡適之的「八不主義」，即是復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

運動主帥的胡適於何地？1935年，胡適終於對周作人此番洞悉毫釐之見作了回應，他辯解自己的主張（雖沒提「八不主義」），並非抄襲或演化自公安三袁，但或許是從閱讀袁枚（子才，1716-1797）的書中受了間接的影響，又說明他新近才從周作人的學生沈啟無（沈揚，1902-1969）所編的《近代散文抄》中看到公安三袁的文章，⁷³以作洗脫。對於周作人之推崇公安派而貶抑胡適，中書君（錢鍾書）指出周作人之見也許是一種「立異恐怖」，並指出：

公安派的論據斷無胡適先生那樣周密；而袁中郎許多矛盾的議論，周先生又不肯引出來。⁷⁴

這既支持了胡適，又揭示了周作人《新文學的源流》所存在的某種意圖。至此，我們不得不問，同為新文學陣營中人，何以周作人對胡適竟有那麼多的批評與不滿呢？原來，胡適曾說過白話小說既是五十年來流行最廣的文學，而《七俠五義》又是此中之最，⁷⁵然而他在後面卻將俞樾所著的《七俠五義》貶為「也沒有什麼思想見地」，就連其詩與文「都沒有大價值」。⁷⁶俞樾是曾國藩（伯涵，1811-1872）的得意弟子，清末的碩學鴻儒，亦是章太炎（枚叔，1869-1936）的老師，即周氏兄弟的太老師，更是周作人弟子俞平伯（俞銘衡，1900-1990）的曾祖父，而卻一再受到胡適的貶斥。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所批評的人物眾多，關係錯綜複雜，卻是同氣連枝，如此源淵，大概也是意氣風發的胡適所始料不及。在此關鍵之處，周作人卻對俞樾作了截然不同的判價，胡適所批評為「沒有什麼思想見地」、「沒有大價值」的俞樾，在周作人眼中卻是以遊戲文學的方式復活了公安派，並無形中影響了胡適以及新文學陣營中人，⁷⁷這又是何其的諷刺？周作人又指出，胡適與公安派不止於文學主張上近似，就連實際創作也頗為雷同，他認為胡適、冰心（謝婉瑩，1900-1999）及徐志摩（1897-1931）的作品就是民國的公安派，又批評他們的作品：「味道不甚深厚」、「仔細地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⁷⁸又指出自己的學生俞平伯與廢名（馮文炳，1901-1967）卻又像竟陵派，而「難懂卻正是

見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94。

⁷³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冊，頁126。

⁷⁴ 中書君：〈附錄三：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見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85。

⁷⁵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頁182。

⁷⁶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頁232，187。

⁷⁷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49。

⁷⁸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26。

他們的好處」。⁷⁹即是說，前者貌似空靈，而徒有其表，後者僻澀，卻有餘韻。此論可謂別開生面，竟如此建構了新文學與古文學之間的源流，而且指出新文學運動的作家既受了彼等所攻擊的古文學家的影響，而卻只學得公安派的皮毛而已。在此，周作人以其「歷史研究法」為新文學之追源溯流可謂別出心裁，卻又處處與胡適針鋒相對。令人不解的是，周作人何以要這樣一再挑釁、嘲諷胡適呢？

五、旁敲側擊：八股文之提倡

追溯公安派對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之外，身為新文學運動的中堅人物的周作人竟然提倡研究八股文，這似乎又是公開與胡適、陳獨秀唱反調。在胡適的〈文學的改良運動芻議〉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兩篇文章中，他們共設立了三個攻擊的靶子：桐城派、駢文體和江西詩派。陳獨秀在其〈文學革命論〉中，對駢文、桐城古文與江西詩派大肆抨擊，甚至稱「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有光〕方〔苞〕劉〔大魁〕姚〔鼐〕」為「十八妖魔」，⁸⁰攻擊的是彼等之「尊古蔑今，咬文嚼字」。⁸¹以上攻擊的便計有以林紓為首的桐城派，及以陳三立（伯嚴，1853-1937）、鄭孝胥（蘇龕，1860-1938）為首的宋詩派。⁸²宋詩派雖志在學古，但並非此處的論爭焦點，在此不贅。當時，錢玄同（1887-1939）又高呼「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攻擊的是桐城派的古文與駢文一脈。然而，周作人在評論八股文的時候，卻別有一番見解，他先介紹了八股文的特徵，此中值得咀嚼的是：

只要遵照各種規則，寫得精密巧妙，即成為『中式』的文章。其意義之有無，倒可不管。……總之這種有定制的文章，使得作者完全失去其自由，妨礙了真正文學的產生，也給中國社會許多很壞的影響，至今還不能完全去掉。⁸³

⁷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26。在1932年9月6日，周作人為其所編的《近代散文鈔》寫了新序，其中指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學的文章，現今的新散文實在還沿著這個系統。」見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21。關於竟陵派的文學理念的相關論述，可參閱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17-361。

⁸⁰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頁22。

⁸¹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頁22。

⁸²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頁376。

⁸³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37。

以上之婉諷的其實就是左翼的「八股」，而卻淡淡掠過。接著他又引用了徐靈胎（徐大椿，1693-1771）的《洄溪道情》而大肆批評八股文，⁸⁴但卻認為桐城派的文章系統與八股文最相近，⁸⁵這也是深懂箇中奧妙方才能說出的識見。而其表層的批評，卻再度令胡適、陳獨秀難堪，周作人竟認為胡、陳二人以至於梁啟超（卓如，1873-1929）均深受桐城派古文的影響。⁸⁶這幾乎是站於超然的位置告訴懵懂少年一樣，周作人似乎在點撥迷路中的胡適與陳獨秀。事出絕非偶然，周作人不會無的放矢。胡適當時將矛頭直指桐城派以及曾派文人，作出狠批，稱之為「強弩之末」、「迴光返照」而終免不了衰亡。⁸⁷胡適將古文學末期分為四個段落：一、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二、譚嗣同（復生，1865-1898）、梁啟超這一派的議論的文章；三、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四、章士釗（行嚴，1881-1973）一派的政論的文章。在四種古文學的段落中，胡適又分別論述其沒落，其中關於翻譯的文章這一派的命運如下：

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在當日雖然勉強供應了一時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說集》便是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適用一方面他們都大失敗了。失敗之後，他們便成了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⁸⁸

即是說，周作人兄弟兩人是在以古文作為翻譯失敗之後才轉投過來新文學陣營的。在此文的後面，胡適再一次拿周氏兄弟的古文翻譯作只賣了二十一冊作為失敗的例子。⁸⁹第三段落關於章太炎的述學的文章中，雖先稱譽了章太炎在學術與思想方面具「成一家言」的成就，然卻指出其復古主義為「反背時勢的運動」，並評定章太炎文章「沒有傳人」、「及身而絕」。⁹⁰對於作為一代宗師的章太炎而言，這是何等的苛評！⁹¹1935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之際，胡適在回顧新文學實績的時候，舊調重彈，周氏兄弟及其老師章太炎在古文上的失敗，⁹²再度成為新文學陣營主帥胡適攻擊古文學最有力的註腳。

⁸⁴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37-38。

⁸⁵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43-44。

⁸⁶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44。

⁸⁷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頁180-181。

⁸⁸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頁182。

⁸⁹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頁200-201。

⁹⁰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頁216，219，220，223。

⁹¹ 據陳平原先生之見，六朝文之所以沒有受到如桐城派之備受攻擊，乃是倡六朝文者乃章太炎（枚叔，1869-1963），而他便是新文學運動中人如錢玄同與周氏兄弟的老師，故而有同門不相鬥的默契。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頁384。

⁹²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冊，頁109，110。

章太炎是周氏兄弟的老師，周作人述及他前往聽章太炎講課，稱其在中年以後仍「不辭以外道為師」而學梵文為：「博大精深的精神，實在為凡人所不能及，足為後學之模範」，具有「偉大的氣象」，⁹³可見其對老師章太炎頂禮膜拜之心。⁹⁴其兄長魯迅也很感念老師章太炎，他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認為章太炎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的還要大」，而「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⁹⁵魯迅之論，迥然不同於胡適之以學術衡量章太炎，甚至可以說是作為弟子的魯迅對老師章太炎的知己之說，在此可見魯迅的戰鬥文原來也是其來有自的傳承。魯迅又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批評章太炎在編《太炎文叢》時不收攻戰的文章，怕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又對其刪掉〈解辮髮〉一文作出委婉的批評，⁹⁶由此益見章太炎在魯迅心目中地位是何其崇隆。對於老師與兄弟兩人一再備受胡適攻擊，敏感而防衛能力極強的周作人焉能忍此羞辱而不反擊？1944年初春，周作人仍念念不忘前塵舊事，重新執筆寫了〈談翻譯〉作出反擊，一開始即說：

零整譯品無甚足道，但是憑了這些經驗，即使是失敗的經驗，也就有了經驗之談……。⁹⁷

周氏兄弟翻譯的「失敗」，是胡適多次批評不宜用古文作為翻譯的例子，而周作人卻直接道出1909年翻譯的《域外小說集》二卷的經驗，直言以古文翻譯「不很費力而容易討好」，⁹⁸這指的是對於作者而言，但為了方便讀者，惟有用白話文翻譯。周作人又指出同樣一直備受胡適抨擊的嚴復的「信達雅」翻譯宣言為「不刊的典則」、「其權威是已經確定」。⁹⁹

至於胡適與陳獨秀之攻擊八股文與桐城派，周作人認為應研究八股文的原因在於「能通舊傳統之極致」，「能知新的反動的起源」，¹⁰⁰甚至聲稱八股文是「中國文學的結晶」。¹⁰¹周作人認為新文學革命，「也原是對於八股文化的一個反動」，¹⁰²而八股文、古文、駢文、

⁹³ 見周作人：〈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止庵校訂：《秉燭談》，頁10。

⁹⁴ 在1932年5月15日，周作人便於家中宴請章太炎，赴宴者中便有俞樾之曾孫俞平伯。見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頁418。

⁹⁵ 見魯迅著：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第1冊，頁1241，1242。

⁹⁶ 見魯迅著：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第1冊，頁1245。

⁹⁷ 周作人：〈談翻譯〉，止庵校訂：《苦口甘口》，頁40。

⁹⁸ 周作人：〈談翻譯〉，止庵校訂：《苦口甘口》，頁41。

⁹⁹ 周作人：〈談翻譯〉，止庵校訂：《苦口甘口》，頁41。

¹⁰⁰ 周作人：〈附錄：論八股文〉，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60。

¹⁰¹ 周作人：〈附錄：論八股文〉，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62。

¹⁰² 周作人：〈附錄：論八股文〉，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62。

新文學四股力量在清末的頡頏，各有優劣，而以新文學脫穎而出，¹⁰³這便是胡適與陳獨秀的革命話語中沒有觸及的複雜細節。八股文是胡適與陳獨秀所大力攻擊的目標，而周作人卻在此大力鼓吹，甚至在短短的「五講」中，花了兩講說明其重要性。此處之論「八股文」乃具明暗之分，既面向胡適、陳獨秀之新文學陣營，又暗諷左翼，可見其抗衡意識之強烈。按周作人的文學無用論的觀點而論，八股文乃「制藝」，乃為考試而作的空洞文章，為何卻偏偏有其重要性呢？而且，周作人既然說「關於八股文方面，我們所知道的很少」，那又為什麼費那麼多篇幅鼓吹呢？周作人指出八股文存在的力量在於民間，而非皇帝特別提倡的緣故。¹⁰⁴這便將八股文與民間扯上關係，即是說八股文屬於他之前所提及的「通俗文學」、「原始文學」，從而說明八股文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問題是，如八股文不成為科考的「制藝」，民間會熱衷這種如他所說的「牽強附會」、「毫沒價值」¹⁰⁵的文字遊戲嗎？而且，八股文那種文字遊戲亦是另一種模式的備考練習，按周作人的文學觀，就是「變相的文學」。既然如此，周作人何以偏偏要提倡學習、研究八股文？周作人引用了魯迅在〈朝華夕拾〉一文中三味書屋的教書老先生讀古文時搖頭擺腦的神情作為說明例子，以說明必須搖頭擺腦以領略字中的音樂成份。¹⁰⁶而搖頭擺腦讀八股文，正是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曾作出的「搖頭擺尾，說來說去，不知說些甚麼」的揶揄。¹⁰⁷「搖頭擺尾」是讀八股文之必然身體律動，而其原則為新文學陣營中的陳獨秀所不知，而深懂箇中三昧的左翼盟主魯迅，又是否有所醒覺呢？

值得一提的是，陳獨秀曾批評桐城派乃「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國民應用之文學之醜陋」，¹⁰⁸即是說周氏兄弟所翻譯之小說就是「應用文學之醜陋」。然而，周作人卻這樣具體地為胡適與陳獨秀勾勒出彼等所不知的桐城派與新文學運動的關係，指出桐城派的範圍在曾國藩手中被拓寬了，並在吳汝綸、嚴復及林紓等人的努力下，吸收了西方文學與思想，並與「新要興起的文學接近起來」，從而影響了新文學陣營中人如胡適與陳獨秀，為新文學的誕生作出了貢獻。¹⁰⁹由此說來，胡適與陳獨秀雖為新文學運動之主帥，兩人合力炮轟桐城派，實為不明就裏的狂轟亂炸而已。

胡適自不甘示弱，他在 1935 年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便作出反

¹⁰³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31。

¹⁰⁴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32。相反，胡適則認為古文之存在是因為科舉的原因。見胡適：《白話文學史》，頁 4。

¹⁰⁵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32，33。

¹⁰⁶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35。

¹⁰⁷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見胡適：《胡適文存》，第 1 集，頁 20。

¹⁰⁸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見胡適：《胡適文存》，第 1 集，頁 20。

¹⁰⁹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44。

擊，除了重提周氏兄弟古文翻譯的失敗例子之外，¹¹⁰甚至認為他提出的才是「新的文學史觀」，「給全國讀文學史的人們戴上一副新的眼鏡」，¹¹¹亦即是起了啟蒙作用，明代復古派的前後七子與公安、竟陵，都是假古董與小家數。由此，他否定了新文學運動之所承來自公安派，更遑論在創作上受了公安、竟陵的影響。胡適譏諷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所說的「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之論為「儻陋見解」，¹¹²當然亦以此否定他受到俞樾的間接影響，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暗諷周氏兄弟之所承。如此暗中較勁，心照不宣。然而，周作人與胡適在文學史觀上之不同及在論述上的較量，並不妨礙彼此的友誼，周作人在 1934 年發表了五十大壽的打油詩後，胡適亦有和詩，而周作人竟在其〈奉和適之先生〉以「至今新八股，不敢過胡家」作調侃，可見他倆學術之爭並不妨礙私交之誼。¹¹³以上關於八股之論，既有嚴肅的學理存在，以溝通新、舊文學之關係，而更多的是潛藏其中的對左翼文學觀之婉諷，即如論者所謂的「左翼所秉持的精神遺傳與歷史淵源」。¹¹⁴

六、「理想的國語」的構思與小品文的提倡

在文字方面素有品味要求的周作人於是乎在梳理語言流變之餘，又創造性地建構其「理想的國語」。周作人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所作的〈導言〉中指出：

民國六年以至八年文學革命的風潮勃興，漸以奠定新文學的基礎，白話被認為國語了，文學是應當「國語的」了……但是白話文自身的生長卻還很有限。¹¹⁵

細味之下，周作人是對所謂的白話文之成功已成事實頗有保留。首先，他指出白話文在清末與民國已有所不同：一、現在白話，是「話怎樣說便怎樣寫」。那時候卻是由八股翻白話；二、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話寫，只是為一般沒有學識的平民和工人才寫白話的。¹¹⁶如此

¹¹⁰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頁 109。

¹¹¹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頁 128。

¹¹²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頁 128。

¹¹³ 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頁 441。1938 年 9 月 20 日，周作人收到胡適於 8 月 4 日自倫敦寄出的白話詩，敦促已附逆的他南下，其中有「智者識得輕與重」、「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周作人即日回詩表達自己的苦衷。詳見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頁 558-559。

¹¹⁴ 丁文：〈周作人與 1930 年左翼文學批評的對峙和對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5 期（2009 年），頁 125。

¹¹⁵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 666。

¹¹⁶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51-52。

論述白話文的複雜性，也是胡適與陳獨秀在不同的文章中所沒有提及的。周作人分辨白話文與古文之別，在於「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內容」，而古文則「大抵在無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¹¹⁷即是說，古文之書寫頗為曲折，而用白話文則是因為其時「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動」，¹¹⁸要求的是直接、明快的表達方式。新文學運動中的關鍵，就是白話文學的書寫。胡適為「白話」作出如下的三種定義，清楚、直接、簡單的語言，就是他所謂的「白話」。¹¹⁹為進一步說明「白話」的特徵，胡適以「生」與「死」判別「白話」與「文言」的關係，¹²⁰又認國語的文法是「一種全世界最簡易最有理的文法」。¹²¹胡適又在〈國語文法概論〉一文中確是實實在在的從音韻、詞彙以至於句子，均作了詳細的論述。¹²²然而，胡適更多的關注則寄望於國語，亟待國語拼音的成功。¹²³由此，顧頡剛將胡適比喻為唐代力斥駢文的韓愈，指出若沒有胡適對白話文的鼓吹，文言文的壽命肯定還要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¹²⁴周作人則以為古文和白話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¹²⁵

周作人又指出文字並不存在死活，其死活在於人的操縱而已。¹²⁶早在 1922 年，周作人便已對建設現代國語作出了具體的建議：採納古語；二、採納方言、三、採納新名詞。又建議從以下三方面進行：一、編著完備的語法修辭學字典；二、從文學方面獨立地開拓，使國語因文藝的運用而漸臻完善；從教育家方面着手，實際地在中、小學建立國語的基本。在第三方面中，又特別提出要學生「能懂普通古文，看古代的書。」¹²⁷周作人「理想的國語」的構思，乃從自己對語言的瞭解出發而作出更為深入的探討及建議。他指出可以以口語為基本，揉和古文、方言以及歐化語，加以合宜的安排，知識與趣味並置，「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再加上自己的性情，¹²⁸從而造出雅致的現代漢語。¹²⁹他人又認為，八股文內含著專制養成的「服從與模仿根性」是必須反對的，然而其駢、散結合的形式卻應

¹¹⁷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58。

¹¹⁸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58。

¹¹⁹ 胡適：《白話文學史》，頁 8。

¹²⁰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第 1 集，頁 57。

¹²¹ 胡適：《白話文學史》，頁 6。

¹²² 胡適：《胡適文存》，第 1 集，頁 443-499。

¹²³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的《導言》〉，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頁 111-119。周作人在〈國語羅馬字〉一文中雖對羅馬拼音存有質疑，但仍然表示支持。見周作人著；止庵校訂：《自己的園地》，頁 61-62。

¹²⁴ 顧頡剛：〈文言改為白話〉，《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 年），第 1 卷，頁 257-258。

¹²⁵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54。

¹²⁶ 周作人；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55。

¹²⁷ 周作人：〈國語改造的意見〉，止庵校訂：《藝術與生活》，頁 56，57，59。

¹²⁸ 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止庵校訂：《苦雨齋序跋文》，頁 127。

¹²⁹ 周作人：〈《燕知草跋》〉，止庵校訂：《苦雨齋序跋文》，頁 123。

該認真研究。¹³⁰「服從與模仿」乃左翼「八股」之劣根性，在婉諷之外，他又進一步提倡「混合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的文章，¹³¹為傳統古文與現代白話文的滲透，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¹³²由此，我們終於明白了他提倡研究八股文的逆向思維所在，即在鍛鍊文字中，將文人的優雅文字鎔鑄於市井俗語之中，又中外兼採，古今並用。他又於 1926 年撰寫〈我學國文的經驗〉，仔細羅列了《四書》以及部分的經、史類而更多的是白話小說，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紓翻譯的《茶花女》、梁啟超翻譯的《十五小豪傑》，尤為林紓的翻譯所吸引。最終，他的建議是博覽以吸取眾書之精華。¹³³

另一方面，周作人「言志」之文學觀上接明末公安、竟陵的文學傳統，而最終歸宿於小品文之提倡及實踐，原因在於小品文是「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¹³⁴而兩派之間，周作人明顯認為公安派之價值在竟陵派之上，後代對公安派貶斥為「淺率空疏」之見，實際卻是「真實個性的表現」、「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¹³⁵這無疑是他自 1921 年 6 月發表〈美文〉後，將抒情敘事為主的藝術散文視作「美文」，以之與小說、詩歌及戲劇並列的位置，尋找到了歷史的精神依據。由此，他在《新文學的源流》中所提出的文學「無目的」、「無用」之論，再到以公安派的「性靈」為新文學之源流，均在於抗議左翼「八股」之服從、模仿以至於為政治之挪用。而在建設性的方面，他又從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學陣營中人所忽略的舊文學以至於八股文中尋找出可以揉合進入建構「國語」的元素，故其對晚明小品文之提倡，亦具此目的。《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後面附錄有「沈啟無選輯近代散文鈔目錄」，包括以公安三袁與竟陵派的鍾惺（伯敬，1574-1624）及譚元春（友夏，1586-1637）為主，下及陳繼儒（仲醇，1558-1639）、張岱（宗子，1597-1679）、李漁（謫凡，1610-1680）等晚明散文家。書前有周作人的序及新序，後有俞平伯（1900-1990）的跋。這無異於獨闢蹊徑，開宗立派。周作人之小品文劍及履及地實踐了其「理想的國語」與「美文」的理念，並以其閒適淡泊與優雅知性而成為新的散文流派，¹³⁶其學生俞平伯與廢名等，便是這一流派的主要散文家。其時，在周作人、林語堂的倡導下，公安派、竟陵派所謂「獨抒性靈」的小品尺牘，如雨後春筍，紛紛重新標點出版，歷來為正統古文家所輕視的晚明小品，竟一時洛陽紙貴。¹³⁷周作人對小品文提倡之努力，實即新文學與傳統文

¹³⁰ 周作人：〈附錄：論八股文〉，止庵校訂：《新文學的源流》，頁 61。

¹³¹ 周作人：〈後記〉，止庵校訂：《苦竹雜記》，頁 221。

¹³² 相關論述可參閱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 年），頁 385-394。

¹³³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知堂文集》，頁 7-11。

¹³⁴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 670。

¹³⁵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 671。

¹³⁶ 關於周作人的散文藝術的論述，可參閱錢理群：《周作人論》（臺北：萬象圖書，1994 年），頁 133-151。

¹³⁷ 相關論述可參閱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頁 396；黃仁生：〈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回響〉，《復旦學報》第 6 期（2006 年），頁 88。

學之匯通，其推崇「即興言志」，強調尊重文學的獨立性與維護自由表達思想見解之文學原則，¹³⁸連胡適也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亦予以揄揚，指出周作人對小品文之提倡「最可注意」、「成功」，而周作人也將胡適的原文引用於〈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中。¹³⁹可見，在面臨左翼的強勢挑戰與維護文學獨立的關鍵上，敦重孰輕，胡適與周作人兩人可謂心照不宣。

然而，周作人之兄長魯迅則對小品文一而再地作出大肆鞭撻。魯迅指出當前的小品文跟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已不一樣，空有吟風弄月的一面，而失卻其不平、諷刺、攻擊及破壞的元素，當前流行的這種「擺設」性的小品文是「麻醉性的作品」，其結局必將是在麻醉中同歸於盡，而「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局需要的是「投槍匕首」、殺出一條血路的文章。¹⁴⁰魯迅之觀點基本就是周作人所指出的作文章而必有益於社會的「載道」。魯迅又嘲諷小品文鼓吹者的「『高人兼逸士夢』恐怕也不長久」，小品文之上者猶「滿紙空言」，甚至「胡說八道」，其下者「卻成打諢」，猶如「猥鄙醜角」；¹⁴¹甚至直接攻擊倡導幽默閒適小品的林語堂（1895-1976）及由其創辦、周作人與俞平伯等人投稿的《人間世》，指出小品文的提倡將必敗無疑，唯一生機是「有待於分析和攻戰」。¹⁴²然而，周作人卻深深地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很像明末」，¹⁴³由周作人心理上將晚明投射於民國的時代感覺，也就不難理解其傾向公安派的原因。¹⁴⁴他認為文學具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¹⁴⁵的獨立而個人的、抒情的屬性，故其所堅守理念是對左翼的「反個人主義」、¹⁴⁶「宗教的氣味」及其所造成的「狂信」的抗衡。¹⁴⁷

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於1927年4月8日在黃埔軍校作演講卻指出他雖並不贊同以文學宣傳、鼓吹、煽動，以促進及完成革命，因為：

¹³⁸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頁23。

¹³⁹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668。

¹⁴⁰ 見魯迅：〈小品文的危機〉，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第1冊，頁814，813。

¹⁴¹ 見魯迅：〈雜談小品文〉，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第1冊，頁1195。

¹⁴² 見魯迅：〈小品文的生機〉，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花邊文學》，第1冊，頁1009。關於魯迅與林語堂之論爭，可參閱黃仁生：〈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回響〉，《復旦學報》第6期（2006年），頁89-90。

¹⁴³ 周作人：〈關於命運〉，止庵校訂：《苦茶隨筆》，頁111。同樣的以民國類比明末的文章，可見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止庵校訂：《苦茶隨筆》，頁61；周作人：〈《燕知草跋》〉，止庵校訂：《苦雨齋序跋文》，頁124。

¹⁴⁴ 關於周作人與公安三袁的文學品味的相關論述，可參閱顧琅川：〈周作人與公安三袁〉，《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第6期（1991年），頁149-158。

¹⁴⁵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679。

¹⁴⁶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頁227。

¹⁴⁷ 周作人：〈與友人談國民文學書〉，止庵校訂：《雨天的書》，頁111。

……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出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入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¹⁴⁸

在此，魯迅文學觀卻倒與周作人的文學無用論，頗為一致。不過，左翼的文學革命論並非魯迅可以左右，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便預言「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¹⁴⁹魯迅之預言，一言成讖，而他之以左翼盟主的身份出面抨擊周作人所倡導的晚明小品文，卻又何其的反諷。

周氏兄弟兩人迥異的文學思想，也預示了彼此的不同人生走向，以及文學在不久的將來的命運。一如魯迅所預言，革命時代的洪流並不允許文學置身事外，民族主義的烈火吞噬了周作人所提倡的個性的、抒情的文學夢，最終他也因捲入附逆的政治風暴而不容於世。¹⁵⁰同樣，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亦在不久後為時代洪流所吞噬。

七、結語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源流》中之論述可謂苦心經營，表面攻擊以胡適為首的新文學陣營之文學史觀及其種種不足，並回擊了胡適昔日對他兄弟二人之翻譯及師承之批評，而其貶抑「載道」而揄揚「言志」，甚至提倡晚明小品文之個性與抒情，均乃意圖力挽左翼之挪用五四文學遺產作為革命宣傳之狂瀾。準此而言，周作人在書中之「追源溯流，旁敲側擊」既是其論述策略，亦是其以學理釐清真相、建構國語及提倡晚明小品文，藉此以捍衛五四文學傳統之獨立與尊嚴。

¹⁴⁸ 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見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第1冊，頁559。

¹⁴⁹ 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見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第1冊，頁559。有關魯迅在文學與革命上的觀念的變化及發展，可參閱李歐梵著；尹慧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年），頁144-162。

¹⁵⁰ 關於周作人「附逆」的文章頗多，早在當時已有頗多不同見解，眾說紛紜，近期的論述多從文化的角度作詮釋，例如楊牧：〈周作人與古典希臘〉，《文學的源流》（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頁91-142；劉東：〈周作人：失去儒家制衡的「個人主義」〉，《二十一世紀》總第39期（1997年2月），頁92-106；董炳月：〈周作人的「附逆」與文化觀〉，《二十一世紀》總第13期（1992年10月），頁95-102。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專書

-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
- 田素蘭：《袁中郎文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 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
- 朱自清：《詩言志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年）。
-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 胡適：《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53年）。
- 胡適：《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 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1998年）。
- 周作人：《新文學的源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
-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陳岸峰：《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
-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張如心：《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
- 張菊香、張鐵榮：《周作人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
- 夏志清、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年）。
-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
-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 魯迅著；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編：《魯迅文集全編·南腔北調集》（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
- 蔡景康編選，《明代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

錢理群：《周作人論》（臺北：萬象圖書，1994年）。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

鍾林斌：《公安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年）。

論文

（一）期刊論文

丁文：〈周作人與1930年左翼文學批評的對峙和對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5期（2009年5月），頁118-130。

王瑜：〈誰在寫史？——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幾篇文章看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讀解的「誤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6期（2012年6月），頁84-92。

胡有清：〈論周作人的個性主義文學思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1996年1月），頁204-215；

郝慶軍：〈兩個「晚明」在現代中國的復活——魯迅與周作人在文學史觀上的分野和衝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6期（2007年6月），頁1-26。

黃仁生：〈論公安派在現代文壇的多重回響〉，《復旦學報》第6期（2006年6月），頁82-124。

劉東：〈周作人：失去儒家制衡的「個人主義」〉，《二十一世紀》總第39期（1997年2月），頁92-106；

董炳月：〈周作人的「附逆」與文化觀〉，《二十一世紀》總第13期（1992年10月），頁95-102。

顧琅川：〈周作人與公安三袁〉，《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第6期（1991年1月），頁149-158。

（二）論文集

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代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羅崗：《記憶的聲音》（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

楊牧：《文學的源流》（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 Ngon-fung. *Yigu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aihua literary history: a study of Hu Shi and Gu Jiegang*. (Jinan: Qilu Press, 2011).
- Hu, Shi. *Hu Shi's Writings*. (Taipei: Yuandong Books, 1953).
- Hu, Shi. *Literary History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Beijing: Dongfang Press, 1996).
- Liu, Shou-song. *A First Draft of Chinese New Literary History*.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1956).
- Lu, Xun. *A Whole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Edit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a Whole Collected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Guoji Wenhua Press, 1995).
- Hsia, C. T. *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Translated by Lau Shiu-ming et al. (Hong Kong: Youlian Press, 1979).
- Qian, Li-qun. *A Biography of Zhou Zuoren*. (Beijing: Shiyue Wenyi Press, 2001).
- Qian, Li-qun, Wen, Rumin and Wu, Fuhui.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v.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Zhou, Zuo-ren. *Zhou Zuoren's Collected Works: The True Colour*. (Changsha: Hunan Wenyi Press, 1998).
- Zhou, Zuo-ren. *Zhou Zuoren's Collected Works*. Edited by Zhi An. (Shijiazhuang: Hebei Jiaoyu Press, 2002).
- Zhang, Ju-xiang and Zhang, Tierong. *A Chronicle of Zhou Zuoren*. (Tianjin: Tianjin Renmin Press, 2000).

Searching for the sources and Probing other streams: a study of Zhou Zuoren's *The Source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Chan, Ngon-fung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3; Accepted March 6, 2014)

Abstract

In *The Source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most of the critics believe that Zhou's comment was a challenge to Hu Shih's view on literary history. In fact, Zhou's viewpoints was not only an attack to the insufficiency of Hu Shih's views on literary history but also a feedback to Hu Shi's academic criticism on him and his brother Lushun and their academic succession. Zhou's underlying intention, he praised the concept of "expressing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and criticized the concept of "conveying Tao in article", and advocated individuality and lyricism of late Ming essays, however, was to prevent the literary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om being appropriated as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by the Left-wing Association. In short, Zhou's "searching for the sources and probing other possibilities" was a strategic discourse, as well as his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to clarify the truth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ideal National Language, to advocate late Ming essays, and hereby to defend the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of literary tradition of May Fourth Movement.

Keywords: Zhou Zuoren Hu Shih New Literature Kungun School National Language

